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环境与历史

美国 and 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William Beinart Peter Coates

[英国]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环境与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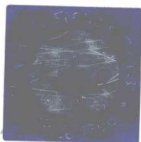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环境与历史》为审视公众关心的许多“绿色”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科技与社会通报》

令人钦佩……[此书的]分析水平使之成为环境史教材的上佳选择。

——《今日非洲》



ISBN 978-7-5447-0741-1



9 787544 707411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25.00 元

HUMANITIES AND SOCIETY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William Beinart & Peter Coat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 (英) 贝纳特 (Beinart, W.), (英) 科茨 (Coates, P.) 著; 包茂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3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
ISBN 978-7-5447-0741-1

I. 环… II. ①贝… ②科… ③包… III. 环境-历史-对比研究-美国、南非 IV. X-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094 号

Copyright © 1995 by William Beinart and Peter Coate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406 号

Yilin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作 者	[英国] 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译 者	包茂红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原文出版	Routledge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 页	2
字 数	119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41-1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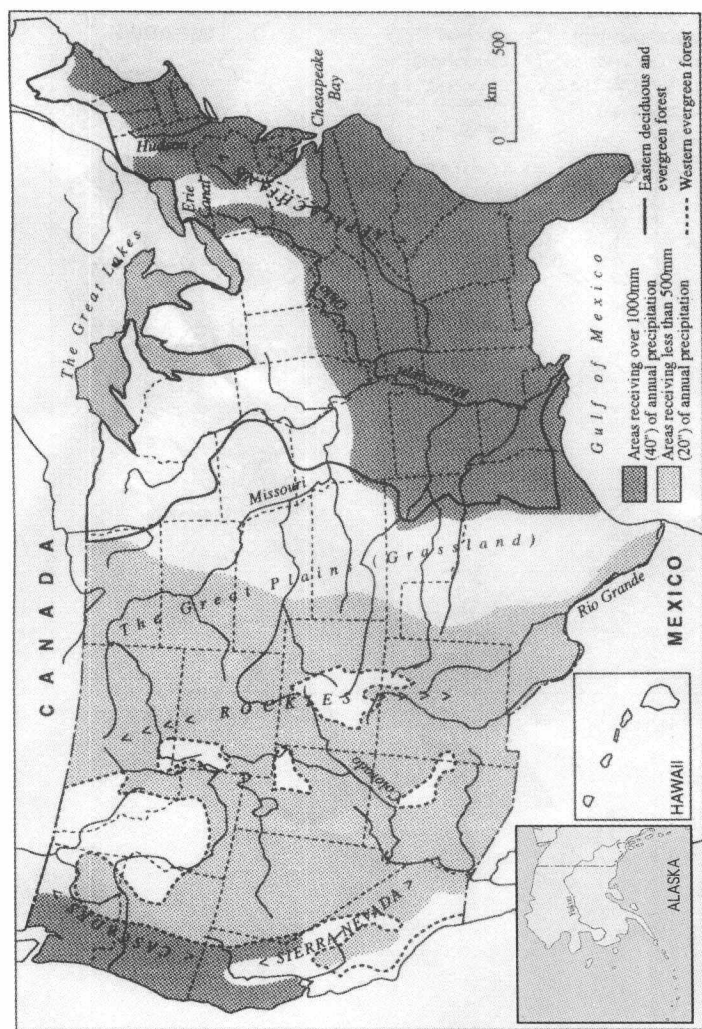
绿色问题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政策关注的前沿问题。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向第二个千年之末时,许多绿色问题仍然被看成是人类破坏能力的新近突然显现。然而,环境变迁的进程深深植根于过去。对危机的感知和应对这些危机的尝试同属于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虽然可能曾被忽略。现在,从历史的视角来探讨当前的环境困境以及人类的应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让人着迷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领域。

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特别适合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它能打破政治、地理的界限和对相互关联的历史研究原始资料进行画地为牢式分割的学科分野。要探索人类经济和文化的生态影响,特别有收获的研究领域就是欧洲人在过去 500 年席卷的那些地方。本书是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从跨国家的环境角度尝试研究历史的第一批著作中的一本,具体而言,就是对美国 and 南非进行比较研究。

《环境与历史》确实是合作的结晶,是许多非正式的讨论滋养出来的。尽管我们两人的专业知识领域差异甚大,但这些讨论常常会撞击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在这个项目即将结束时,这两个地区的历

史聚合所产生的共鸣仍在继续着。在分头撰写三章的草稿之前,我们对每一章的内容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讨论。最后的定稿是我们多次在蓝色屏幕前研讨的结果。(本书构思于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很适合环境史学家,我们通过观察户外白桦树和苹果树上四季的变化来更新自己的心情。)老实说,本书的大部分段落——甚至句子中都渗透着我们两人的思想,都打上了我们两人风格的烙印。如果美国方面的内容有时稍微多一些,那只反映了近年来对美国的研究更多的事实。

我们感谢格兰齐拉和特罗斯在本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候给予的支持。还要感谢简·卡拉瑟斯对书稿做出的详细评论。



审图号: GS (2008) 675号

图1 美国自然地理特征选列

- 东部落叶林和常绿林
- 西部常绿林
- 年降水量 1000mm 以上
- 年降水量少于 50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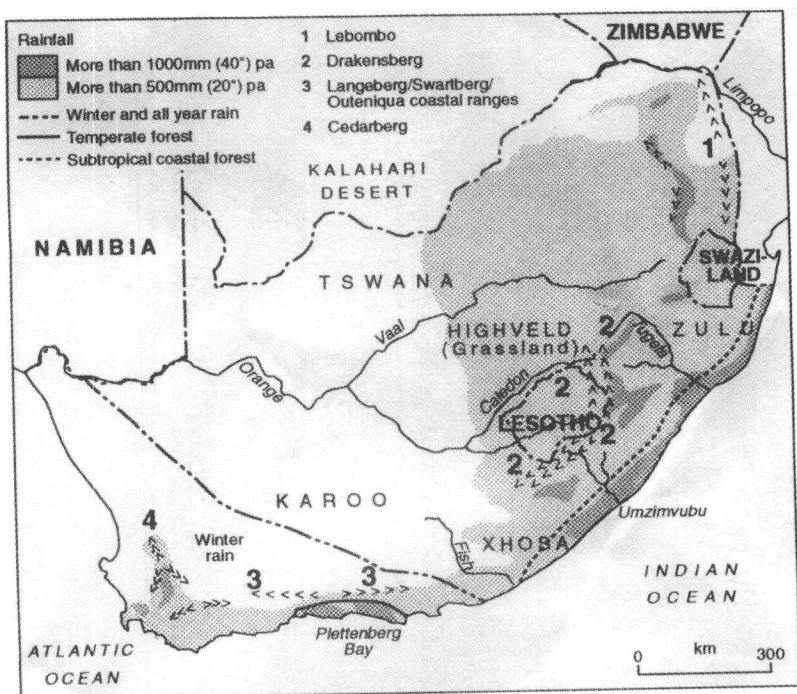


图2 南非自然地理特征选列

审图号：GS (2008) 675号

- 年降水量 1000mm 以上
- 年降水量少于 500mm
- 冬季和全年降雨
- 温带森林
- 亚热带海岸森林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	001
环境史的特点	001
比较	008
边疆环境	011
第二章 狩猎和动物:从猎物到野生动物	022
前殖民时期的狩猎	023
殖民者的狩猎	026
狩猎管制	034
第三章 树木的兴衰:森林、采伐和林业	044
树木与人	045
林业与资源保护	054
第四章 农业:无限和有限的开发	065
无限的开发	065

资源保护主义的政府	076
第五章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荒野的重新估价和自然化	091
非功利性保护主义、旅游业和对自然的描述	091
生物中心主义与公园政治	102
第六章 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主义运动和其他	117
环境思想	117
种族、环境主义与社会不公	124
后记:驯化野性	135
索 引	145

第一章

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

环境史的特点

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对话，它关注的焦点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新视角是史学女神(克里奥)的新暖房，它认为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游离于自然之外。正如克罗斯比所强调的，“人在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家或其他什么之前，首先是一个生物体”(1972:xiii)。历史学的大多数其他分支学科不论涉及高层政治还是经常被遗忘的百姓，往往都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的出发点与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假设大不相同。用克罗农的话来说，“环境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把研究范围从人类制度(经济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制度，政治组织，文化礼仪)扩大到给这些制度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历史“必然要把一系列非人类的因素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这些因素即使出现在历史叙述中，通常也只处于历史分析的边缘位置”(1983:vii)。

尽管这个分支学科是新兴的，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但它

在学术上仍有着深远的渊源,许多学科为它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包括历史地理学、人类生态学、边疆史、法国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以及关系不那么明显而自觉的非洲史和人类学。美国人通过对本国历史的研究促使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名列前茅。最初,北美作者主要关注对自然的掠夺和自然保护运动的英雄般的崛起。他们热衷于研究自然资源政策及其保护制度和机构,热衷于研究诸如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出现1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环境史研究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现代环境运动兴起及环境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不过,这种形式的环境史仍然局限于已有的政治史、行政史和思想史的视角之中。

当美国历史编撰学影响南部非洲环境保护研究的时候,前大英帝国的环境史学家表明要反对这种“美国佬帝国主义”的表现。格罗夫(1994)考察了英国扩张激起的环境关注的悠久历史,指出这比美国作家乔治·珀金斯·马什那本很有影响的名著《人与自然》(1864)(参见第三章)要早。这说明存在着一个跨国的、相互联系的、对相似的环境状况做出反应和思考的认识体系。

与此同时,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也在其他令人兴奋的方向上扩展开来,其中大多数研究的是环境的历史而不是环境主义的历史。在当前相对凸显的内容,主要是在强大的、充满焦虑的现代环境主义驱使下,特别仔细地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破坏环境的能力。一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环境史著作探讨了自十五世纪末以来欧洲扩张造成的多方面的、全球性环境破坏,不过,它们把环境变化等同于环境损失。罗斯比认为,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就是研究环境变化,他强调生物生态因素在世界温带地区的欧洲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罗斯比还指出,他所谓的由植物、动物和疾病组成的“生物旅行箱”在这场全面的景观替代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学者们不但以白人(及其非人类的盟友)如何控制自然界为研究重点,而且对生态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奇特行为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越来越感兴趣。克罗斯比研究生态帝国主义的著作也是呼吁把自然界纳入历史解释中的一种尝试。对于迫切希望写出这种环境史而不是满足于写一个动物保留地、国家公园或环境保护运动著名人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里是问题与挑战并存。无论是从字面理解还是从象征意义上讲,这都需要一个走出书斋的开放的研究取向。阐明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不仅需要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训练中得到的分析工具,而且需要来自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全方位的视野似乎需要拥有比普通科学家更多的技巧。掌握这些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工作。但作为通才,历史学家能在讨论环境变化及其连续性中把握住核心问题。

我们应该能对生态破坏的特征和程度做出一些评估。在目前的环境史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核心概念,那就是退化。然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改变本身从未静止过的自然界的构造。把所有变化看成衰退的批评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不论在什么经济或意识形态体系下,人类生存都具有合法性。区分退化(尤其是长期的)与变迁或转型(这是较少感情色彩的表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界已被人类打上了深刻而复杂的烙印,要探求一种能得到承认、可以定义的自然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棘手的现实。其实,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可能更多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实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底线,企图描述环境变迁的特征就会更加困难。

自然的概念永远都是文化的表述。对欧洲人来说,这种表述也许不会令他们震撼深思,因为欧洲的景观本身就差不多是一个混合体。但在新世界——起码对欧洲人来说是“新”的世界,这种差别不但对欧洲殖民者和来访者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对他们的后代来说也是如

此。因此,后来在表现荒野崇拜的描述中,可以找到对那种没有遭到人类社会改造的原始自然的想象和偏爱。生态关系肯定有自己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可以看成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动力学体系,但并不一定是不受人类干预的稳定动力学体系。生态相互作用的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影响。我们不能决定狮子怎么吃或吃什么,但我们肯定能限定它在哪儿吃。

当前的环境史并非仅仅沉溺于对现代环境破坏的(常常是)痛苦的思索。前工业化时代的人也得到了重视,对他们在环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的判断是相当矛盾的。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认为前殖民时代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是和谐和平衡的关系。这种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他们被指责为不能把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粗野、懒惰的野蛮人”;另一种是十分赞成甚至崇拜他们,特别是在采用当前的绿色思想后。许多今日流行的环境主义文献都把前殖民社会、尤其是“石器时代”的土著美洲人和桑人^①描绘成“自然之子”。他们只是轻微地利用土地,从未达到足以破坏环境的技术水平或人口压力。

专业的人类学和人种史对这种描述进行了更多批评,转而把土著人更多地看成是调节者,完全有能力使自然界为他们所用,纵然土著的礼仪、流动性和生活方式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其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我们应该牢记,北美的土著本身就是闯入新世界的入侵者。在1.2万年(或许是3万年)前,他们从亚洲迁到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向南扩散,一直到火地岛。狩猎采集者对南部非洲的占领至少与北美当地人从阿拉斯加南移到火地岛的历史一样悠久,但说班图语的非洲

① 几千年前就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最初的狩猎采集社会,后来被非洲人扩张部分地取代。

人^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穿越了非洲次大陆,在不到 2000 年前占领了南部非洲。

这些超乎寻常的扩张想必是由人口增长、机会主义的掠夺和当地资源的耗竭促成的。美洲、澳洲和其他地方的古代移居者至少要为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发生在更新世的大型动物的灭绝负一部分责任,这种灭绝要么是过度狩猎造成的,要么就是对植被进行持续大面积的烧荒造成的。克罗斯比把这些早期移民刻画成随心所欲的、富有侵略性的殖民地开拓者。在最近为纪念哥伦布航行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五百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中,既有普通的庆祝,也有谴责。或许我们也应该为跨越白令大陆桥举行纪念活动。

两大半球相接触之前的土著社会肯定不是游离于变化进程之外的“没有历史的民族”(Wolf, 1982)。他们与自然共存的能力遭到怀疑,他们至少也面临着生存和毁灭的潜在危机。毁林恐怕是十三世纪美洲西南部阿纳萨齐农耕社会崩溃的主要因素,其文化越来越依赖方圆五十英里通过严密的朝贡体制供应的木材,可惜的是这种体制最终也被打破了。^② 同理,大津巴布韦(坐落在今津巴布韦疆域中心的一个古代王国)在十六世纪的衰落可能也是在心脏地带周围过度放牧了数世纪造成的。土著与自然的关系很可能经历了不同阶段:可持续的实践和思想代表着在错误中摸索的结果。历史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

① 我们使用的“非洲人”这个术语意指在遭遇白人时生活在这一地区已有政治体制中的当地人。在北美,“印第安红种人”这个术语已被抛弃,代之以更敏感的标签“土著美洲人”(Native American),但“美洲印第安人”的称谓即使不在行动主义者的圈子里使用的话,也仍然在学术话语中大方地使用。不过,在南非,“土著”(native)这个词被殖民者所采用,并逐渐披上了种族思想的外衣。长久以来,当地人拒绝使用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非洲人”或“黑人”这样的称谓。

② 现在的无树沙漠曾经树木葱茏,保存在狐尾大林鼠的尿液结晶体中的针叶松是一个证明,这些结晶体取自狐尾大林鼠的巢穴化石。